

「瀛寰录」中国历史地理学书系

出土文献与楚秦汉 历史地理研究

Chutu Wenxian yu Chu Qin Han
Lishi Dili Yanjiu

郑威 著



科学出版社



羸 寰 录

Inclusion of World Historical Geography

中国历史地理学书系

出土文献与楚秦汉 历史地理研究

郑 威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出土文献向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楚简、秦简、汉简是其中体量最大的部分。本书以楚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地理资料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楚国的封建制、县制及秦汉郡县等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价值的观点；书中大致勾勒出了楚秦汉封建、郡县的不同状态，可供学界参考。

本书适合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学者和研究生，以及历史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文献与楚秦汉历史地理研究 / 郑威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03-055064-4

I. ①出… II. ①郑… III. ①历史地理—研究—湖北—秦汉时代
IV. ①K9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7332 号

责任编辑: 陈 亮 穆 俊/责任校对: 韩 杨

责任印制: 张克忠/封面设计: 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www. sciencep. 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1/4

字数: 298 000

定价: 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出土文献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近年来新公布的简牍材料，如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等，记载了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楚国县邑、封君以及秦汉郡县等，为楚秦汉历史地理，特别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演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就分封制而言，楚国经历了从全面模仿周王室的分封采邑制，到分封采邑制为主、县邑为辅，然后分封采邑与县制并行，再向郡县制与封君封邑制并行的转变过程。秦末汉初，楚国的分封制对张楚、项羽、刘邦政权均有影响，汉代的王国、侯国之制中亦有楚制的因素。就郡县制而言，战国秦汉是其确立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从战国时期的初步推广，到秦代单一郡县制的实施，最终在汉代形成了郡国并行制的发展过程。郡县制的确立，对秦汉以降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而楚地郡县出现早，材料丰富，演变过程复杂，在早期郡县制研究中具有代表性。

郑威博士长期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具有扎实的出土和传世文献功底，他的《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一书运用新资料对楚国分封制进行了系统讨论，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好评。以此为基础，他在本书中系统梳理了包山楚简、葛陵楚简中所载封邑内部的地理单位，指出以平夜君为代表的封君领地的面积和规模都比较大，类似于楚国的大县或附庸小国；战国中期以后，受到吴起变法相关措施及赏爵制盛行等因素的影响，封邑数量增多，然规模受到压缩，这一措施削弱了地方实力，促进了中央权力的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楚国地方行政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

同时，他从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出发，将研究范围拓展至与之紧密相连的郡县制研究，大致厘清了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县性质的演变，指出在中央和地方相互冲突与妥协的过程中，中央调整了楚县原有的结构，使县的军事性质逐渐消失，成为普遍设置的政区形态，遍布于楚国全境。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战国中期之后楚国地方实力的削弱，楚国西部失地连连、都城多次东迁皆与之有直接的关联。



利用出土简牍等资料，以“中央—地方”关系变动为中心展开深入讨论，颇具新意，对先秦封建、郡县制度的研究均有较大推进。

战国秦汉县级政区有很强的延续性，郡级政区则常有兴废变动。简牍材料记载的县级政区很多都出现于战国时期，至秦汉沿袭不改，体现了县级政区的稳定性。而郡级政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更替频繁。《出土文献与楚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利用出土文献中秦至汉初的材料，深入分析了东周至秦汉时期一些郡县设置的继承与嬗变关系，例如从包山楚简关于“鄱”地的微观变化入手，探讨了楚秦汉时期地方行政的延续性；以里耶秦简资料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战国秦汉时期即墨都—琅邪郡—即墨郡—胶东郡的沿革路径；以尹湾汉简、贞柏洞汉简材料为线索，认真分析了西汉东海郡、乐浪郡的城邑分布与空间伸缩等。这些论文，均受到出土文献的启发而作，所论虽以细致的考证为基础，但皆能将其置于秦汉帝国统一政区体系中加以考量，以小见大，不失宏观上的关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参考借鉴作用。

当然，分封、郡县制虽然是楚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在利用新材料研究政区沿革的同时，不能忽视这些材料中的其他信息，如区域内的族群地理，一统国家形成的地理基础，城市、聚落的分布与构成，县级政区以下的基层行政运作等。目前，郑威还承担着“周代汉淮地区的族群融合与统一进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科研项目，并刚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池田雄一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大致体现了他在该领域的探索思路和动向。

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勤奋与专一必不可少。希望郑威能够持之以恒，迎难而上，努力钻研，在早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取得新成果。

是为序。

徐少华

2017年中秋于珞珈山

目 录

第一章 出土文献与楚人封建研究.....	1
第一节 《史记·楚世家》熊渠封三子史料性质小考	1
第二节 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的采邑制与地方政治体制	6
第三节 楚“棠君”考	17
第四节 墨子游楚鲁阳年代考——兼谈出土材料所见楚国县大夫 与封君之称谓	24
第五节 出土文献中所见楚国封君领地的构成	35
第六节 “夏州”小考——兼谈包山楚简“路”的性质	52
第二章 出土文献与楚县研究.....	58
第一节 从县邑之县到郡县之县：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县制的演变.....	58
第二节 战国至汉初的鄢君与鄢县、鄢阳县	70
第三节 鄂君、鄂县综考	81
第四节 葛陵楚简地名考释二则	88
第五节 襄城公戈与襄城地望考	92



第三章 秦简牍与秦代郡县研究	98
第一节 洞庭郡新识	100
第二节 即墨置郡考	106
第三节 巴蜀郡县三题	112
第四章 汉简牍与汉代郡县研究	121
第一节 汉帝国空间边缘的伸缩：以乐浪郡的变迁为例	121
第二节 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	140
第三节 简牍文献所见汉代的县级政区“邑”	172
外二篇	205
《禹贡》徐州篇与《鲁颂·閟宫》所见地理景观比较分析	207
从“楚国之楚”到“三楚之楚”：楚文化地理分区演变研究	216
后记	230

表 目 录

表 1-1	包山楚简所记封君领“州”表	39
表 3-1	里耶简文所见《汉书·地理志》武陵郡辖县表	103
表 3-2	里耶秦简牍所见蜀郡、巴郡所辖县（道）表	112
表 4-1	《户口簿》释文情况表	125
表 4-2	初元三年、四年乐浪郡县别户口统计表	126
表 4-3	汉乐浪郡地理空间变迁表	137
表 4-4	景帝三年东海郡辖县、邑情况表	142
表 4-5	尹湾汉牍所见东海郡下辖县、邑、侯国之令、长、 相秩次表	168
表 4-6	两汉时期东海郡辖县所属变动情况表	169
表 4-7	东周秦汉时期东海郡地区原生型城邑演变情况表	170
表 4-8	简牍所见汉邑地理分布表	200
外篇表 1	先秦文献有关“徐州”地理景观对比情况表	209
外篇表 2	秦末汉初重要楚人将领地理分布表	221
外篇表 3	《史记·货殖列传》所见楚文化地理分区情况表	224
外篇表 4	《汉书·地理志》所见楚及相关文化地理分区情况表	227

第一章

出土文献与楚人封建研究

西周王室封建诸侯有畿内、畿外之别，受封于王畿内的卿大夫食采，“采邑就是王畿之内的诸侯国”^①，受封于王畿外者就国，“以藩屏周”。采邑和封国的受封对象、性质、权利与义务等虽有差别^②，但都是西周分封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史研究中，狭义的分封制一般指畿外诸侯的分封，广义的分封则包括畿内采邑、畿外分封及西周中晚期在较大诸侯国中出现的分封现象。

一般认为，周成王封熊绎是楚国确立自身诸侯地位的标志。熊绎受封后，周的分封制也开始为楚承袭，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西周春秋时期，以采邑制为主；战国时期，封君制逐渐取代采邑制。采邑制和封君制都是楚国分封制和地方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拟先对西周春秋时期楚国采邑制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与楚国地方政治体制、楚王权之间的关系，然后依据战国出土文献对楚国的封君制略作探讨。

第一节 《史记·楚世家》熊渠封三子史料性质小考

熊绎始封于楚之后，《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有“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③的记载，《史记·楚世家》作“俱事成王”^④，说明熊绎在受封前后，一直与周王室有较密切的联系。吕文郁先生认为不少外封的诸

① 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② 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19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9页。

④ 《史记》卷40《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2页。



侯，“人为王朝公卿者，在畿内另有采地”^①。依此说，不少诸侯国君兼具畿内采邑主和畿外诸侯两种身份。若楚王熊绎也是这样的话，则应该会对楚国自身分封制的发展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熊绎之后，楚人长期在南方发展，并逐渐扩张，至熊渠时，《史记·楚世家》有这样的记载：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郢。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②

学术界多认同楚国内部的分封制肇始于此，但关于这段记载仍有很多难以解明之处。其一，众所周知，楚君称王始自武王熊通，为何早于武王一百多年的熊渠会封其子为王，而在熊渠以下直至蚡冒的七世数君均安守屏周的藩职？如果太史公所记不误的话，此事件在楚史的发展过程中颇显突兀。其二，武王熊通之前楚君一直称“敖”，熊渠也当是承袭了“敖”的称呼，称“敖”之楚君不自封王，反封其子为王，似乎不太合情理。太史公借熊渠之口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来解释，仍显牵强。既不与中国之号谥，为何偏用王号？仅言封子为王，熊渠自身称号应当未变，仍为“敖”，则父为敖，子为王，“敖”贵于“王”；至武王自立为王时，反是去“敖”号，尊“王”号，二者似相抵牾。其三，《左传》《国语》等史料中有很多春秋时期楚人对祖先历史回顾的记载，罕见有提及此事者；包山、新蔡葛陵等新出楚简记述的祭祀体系中，也未见有称熊渠三子为王的记载。

与《楚世家》上述记载类似的文字又见于《世本·帝系》《大戴礼记·帝系》。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都引述了《世本》的相关记载，清人秦嘉谟所辑佚文云：

① 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② 《史记》卷40《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2页。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子名为无庸，为句亶王；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其季子名为疵，为就章王。^①

《大戴礼记·帝系》：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威章王。^②

除了个别名号略有差异外，这两段所记述内容基本相同，可以推断《世本》与《大戴礼记》之《帝系》篇本出一源，太史公曾在《五帝本纪》中提到他当时曾见《帝系姓》章，所以也不排除他在撰写《楚世家》时参考了《帝系姓》，而《帝系姓》《世本》《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帝系》或许也有近似的渊源。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先生考察了楚国世系后说：“就楚世系而言，《史记》所选用的材料中有可能包含有楚世系，其形式跟《世本》相似。”^③

《楚世家》接下来讲：

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④

藤田先生通过对《楚世家》结构和所使用的材料来源进行剖析和解读后，将有确切在位年数的“熊勇”之前的文字归为第一部分，认为其后文字所记载的世系出现的时间恰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始时间相同，是司马迁当时所能上溯

①（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卷1《帝系篇》，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② 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795—796页。

③〔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④《史记》卷40《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3页。



到的最古年代。这两部分所依据的材料不同，第一部分“也许有一部分依据的是楚国的世系资料”，“这些先祖的记述，虽说传说的色彩很重，但同时也的确包含着纪年资料出现之前的世系传递信息”。^①

再来比较《楚世家》《帝系》关于熊渠三子的记载，首先，太史公先说是“康、红、执疵”，复又言“熊毋康、熊挚红、熊延”，似有所不同；其次，《帝系》中仅说三子各为“某某王”，未说是熊渠所立，也没有“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的相关记载。或可推测，太史公在撰写第一部分文字时，参考了当时可见的《帝系》材料，同时为了与第二部分内容相衔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帝系》的记载进行了加工和补充。

前文藤田先生的观点已经指出司马迁撰写第一部分所依据的材料传说色彩浓厚，这说明《帝系》的相关记载也有一定的传说色彩，所谓“某某王”不一定与熊通所称之“王”意思相同，也许不是熊渠所封，太史公的释读有可能存在偏差。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中结合文献记载和彝器铭文分析称：“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公、称君无异”，“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② 据此也许可以说，《帝系》记载的内容包含了楚人世代传袭下来的世系信息，其中有熊渠三子为王的记载，但这可能只是对三子的尊称，与周王称号并不冲突，太史公读到这些材料时度以己意，遂补充曰王号为熊渠所封，后畏厉王伐楚而去三子王号，这也许是与史实不符的。

日本学者吉本道雅先生根据王国维的观点对熊渠三子所称之“王”作了重新解读，他谈道：“西周时期诸侯中有一些使用王号，这与周王朝的支配地位并不矛盾，因此，依据称王来判断诸侯与周王朝相对抗的相关记述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引用《韩诗外传》《括地志》中关于熊渠子传说和“鄂王神”的相关记载，认为“‘鄂王’的‘王’实际上原本有可能是作为神号的‘王’”，“熊渠及其三子的一些传说大多可能形成于战国后期”，《帝系》将战国后期这些孤立地存在

① [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② 王国维：《观堂别集》卷1《古诸侯称王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3页。



于各地的神话、祭祀现象体系化，以与秦统一中国的趋势相呼应。^①

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史记·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②唐武昌县在今鄂州，其附近有鄂王城遗址^③，位于今大冶市西南，原属鄂城县，城周围墓葬多是战国晚期的楚墓，所以城址的年代不会很早。今鄂州一带在战国中后期是自今南阳一带迁徙南来的鄂君家族的封地^④，战国后期可能形成了一些关于熊渠中子鄂王红的一些传说，此后人们将鄂王红神格化，并将其附会于鄂君的封邑，《括地志》的相关记载可能体现了这一点，而“鄂王城”之名的出现或许也与此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还原《楚世家》熊渠封三子为王记载的形成过程：楚地原本有一些关于熊渠子、鄂王等三王的分散传说和祭祀现象，如吉本先生所言，“王”仅作为神号存在，经过《帝系》的体系化梳理之后，形成了熊渠三子皆称王的记载，太史公误读了《帝系》中这些王号的含义，杂以自己的理解和推断而写下了上述文字。当然，熊渠三子也有可能确实曾有王号，但正如王国维所提到的，王号都是尊称而已，非由熊渠所封，也与周王称号不相冲突，熊渠也自然不会因畏厉王伐楚而去其王号。此外，春秋战国可能是华夏第一次调整其族群边界的时期，此时吴、越、楚、秦等国王族都寻得或假借华夏的祖先来完成自身的华夏化^⑤，楚之先世世系与熊渠三子传说的出现可能也都与此相关。

《帝系》《楚世家》中三王前均冠有名称，太史公认为都是江上楚蛮之地的地名。谷口满先生分析了《楚世家》提到的庸、鄂（包括东鄂、西鄂）、句亶的地望后提出这些地方都在武王以降楚国核心统治区的外侧，说明这段文字反映的是武王之后楚国欲北进中原、东指江淮的发展态势，大概是武王称王之后产生的传

① [日]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年，第320—322页。

② 《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3页。

③ 大冶县博物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第23—28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册“大冶市文物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128—129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册“文物单位简介·大冶市”，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④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鄂君、鄂县综考”。

⑤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9—180页。



说。^① 吉本先生则认为应该是战国后期祭祀熊渠三子的地点。^②

我们认为,对熊渠三子称王的重新解读并不意味着对《楚世家》相关记载的全盘否定,关于熊渠三子的传说可能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熊绎之后楚国不断开疆拓土,扩大辖域,包括熊渠三子在内的一些楚人贵族有可能被分散到各地进行治理,或许楚君会仿效周王室封予他们采地,经过长期的经营他们在各地颇有声望,受尊称为王(仅是尊称而已),而在其卒后,也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说日渐增多,至战国时期在各地有将其神格化,并各加祭祀的可能。后世如关羽、包拯逐渐神化的事例似可佐证这一点。依据这一推论,可知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发展和疆域的扩大,西周的封建制度为楚人所继承,在楚国境内悄然萌芽并发展起来。

第二节 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的采邑制与地方政治体制

一、西周至春秋中前期楚国的采邑制

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周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强国通过兼并和扩张,所辖领地大增,它们纷纷效法周室,在各自境内分封授采,采邑制逐渐成为各国普遍施行的一种政治制度。楚国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王族、世族受封食采,见于记载的有蒧氏、屈氏、斗氏等,它们的长期存在对楚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对这些采邑的始封状况略作探讨。

1. 蒧氏

《通志》载:“蒧氏,亦作‘茆’,半姓,楚蚡冒之后。蒧章食邑于蒧,故以命氏。按楚有地名茆,又有蒧滢,则知蒧为楚邑矣。”^③ 郑樵认为春秋早期的蒧章

① [日]谷口满:《楚都邑考》,《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第一部B,社会科学编第28卷第2号,1978年,第1—14页。

② [日]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年,第322页。

③ (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1页。



为蒧氏之始受采者，食邑于蒧，因以获氏，传统观点基本沿袭此说。《通志》为晚出文献，其关于蒧氏记载的可靠性颇受学者怀疑，张君与李零先生并引《国语·郑语》所载“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隼是立，蒧氏将起之，祸又不克”驳郑樵之说。张君先生说，“蒧、茆虽音同义近，而且茆氏也确系蒧氏的一支，但并非蒧氏本身”^①。李零先生认为“楚茆氏一支是出于叔熊”，以鲁国“三桓”比之，则相当于“楚国的叔孙氏”^②。二人均赞同蒧氏起源早于蚡冒之时，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田成方据淅川下寺出土青铜器铭文等材料，清理了蒧氏的族源及相关宗支，认为其采邑可能在今淅川县西南、丹江西岸。^③

2. 屈氏

关于屈氏族源，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引《帝系》曰：“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④王逸认为屈氏始于武王子瑕，以屈地为采邑，其后即以屈为氏。历代学者基本沿袭此说，如《史记正义》《元和姓纂》《通志》等。但近些年，这一观点受到质疑。张君先生在基本赞同屈瑕为屈氏始封者的前提下，认为他是武王之弟，而非其子。^⑤赵逵夫先生则完全否定之，认为屈氏始封君为“伯庸”，亦即前引《史记》所言熊渠之长子康（《世本》作庸），受封于庸。^⑥蔡靖泉先生认为屈氏实为楚王蚡冒之后，蚡冒和莫敖音近或可通，蚡冒之后称莫敖氏，初为宗族首领之称，至武王末年楚之官僚体系初具后，莫敖方为官名。^⑦王廷洽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⑧

今按，上文谈到，史料中关于熊渠子受封记载的真实性仍有待商榷，赵氏之

① 张君：《楚国斗、成、蒧、屈四族先世考》，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楚文化觅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186页。

② 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第2期，第47—54页。

③ 田成方：《楚公族诸氏源流、封邑及相关问题探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20页。

④（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1《离骚经章句第一》引王逸说，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⑤ 张君：《楚国斗、成、蒧、屈四族先世考》，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楚文化觅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186页。

⑥ 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亻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屈原与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⑦ 蔡靖泉：《楚国的“莫敖”之官与“屈氏”之族》，《江汉论坛》1991年第2期，第70—74页。

⑧ 王廷洽：《楚国诸敖考释》，《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第76—80页。



说颇显牵强，蔡氏之说有一定的道理，但王逸去古未远，所引用《帝系》中武王僭号称王的记载同见于《左传》等史料，可信度较高，在目前没有出土资料足以改变王逸观点的情况下，我们仍倾向于屈瑕受封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 年）载“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复茄人焉”^①，近有学者以“州屈”为屈氏采邑，其地望所在，约有三说。清高士奇说：“或曰，州屈在今凤阳府附郭凤阳县西”^②，未点明此说来源，也未加肯定。周笃文先生引康熙《临湘县志》记载以其在湖南临湘。^③ 黄崇浩先生不赞同周说，认为“州屈”当分读，“屈”可能是《竹书纪年》“七年，翟章救郑，次于南屈”之“南屈”，并以其地望在河南西南部，认为这是屈氏始受封地。^④

今按，黄说颇不妥。黄说所引为今本《纪年》，王国维早已指明其伪并条辨之，清代以来学者辑佚而成的古本《纪年》中，此条引文辑自《水经注·河水》等文献，较今本少“七年”二字，作“翟章救郑，次于南屈”，事件年代不明，或认为可能在魏襄王十五年。^⑤ 翟章所救之郑，即韩。魏襄王时当韩宣惠、襄王时期，据《战国策》记载，这个时期秦国多次攻韩西境，尤以攻宜阳为多。翟章所救也应是韩国西境，从魏国疆域观之^⑥，自魏河东地区出发最近也最合理，而不是黄说中提到的自魏都大梁出发，魏军驻扎的南屈，当在魏河东地区。《国语·晋语一》载晋献公时有“蒲与二屈，君之疆也”^⑦ 的记载，说明蒲与二屈都在春秋晋国境内。应劭、酈道元已指明二屈指的是北屈与南屈，杨守敬考证出北屈故城在清代山西吉州北^⑧，即今吉县北，恰在魏河东地区，南屈当在北屈之南，即今山西吉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468 页。

②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 9《楚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6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600 页。

③ 周笃文：《屈原的首丘情结及屈氏封地考略》，《云梦学刊》2006 年第 4 期，第 51—53 页。

④ 黄崇浩：《“州屈”不在湖南而应在河南》，《云梦学刊》2007 年第 5 期，第 38—42 页。

⑤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63 页。

⑥ 李晓杰：《战国时期魏国疆域变迁考》，《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74—88 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1 册，“诸侯称雄形势”图幅，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33—34 页。

⑦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61 页。

⑧ （后魏）酈道元注，（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 4《河水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79—284 页。



县以南某处，概不出献公时晋国辖域南境，不可能远至黄氏所提到的河南省西南部。据此，“南屈”与“州屈”无关，自然也不是屈氏所受采邑。

高士奇为清康熙年间人，所以凤阳说和临湘说都流行于康熙年间，惜未有史书记载二说上源，难以追溯。考之武王时期，楚国的扩展刚刚开始，势力范围不可能远至凤阳，也不一定能及临湘，州屈地望即使真在此二地之一，也不太可能是屈氏的始封地。屈氏采邑当在武王统治时的楚国中心地域，具体地望仍然待考。

3. 斗氏

斗氏为楚王若敖一支，《左传》宣公四年（前 605 年）载：“初若敖娶于郢，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郢，淫于郢子之女，生子文焉。”^① 郑樵认为斗氏以受封地为氏：“斗氏，半姓，若敖之后，按若敖名熊义，其先无字，斗者必邑也。其地未详。”^② 由于史书所载楚王若敖与斗伯比活动年限之间相差过大，很难为父子关系，故杨伯峻注云：“楚先君若敖当西周之末，东周之初，与此若敖恐非一人。”^③ 张君先生则提出一个折衷的观点，认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若敖’还保留着其原始的‘父’或‘长老’的涵义。……在楚君若敖与斗伯比之间事实上还隔着一代人，此人乃楚君若敖之子，别封斗邑，为斗氏始祖，在其家族中被尊称为‘若敖’。”^④ 罗运环先生则说，“斗伯比之父本以先君熊仪之谥号‘若敖’为氏，因食采于斗，亦称斗氏”^⑤。若依此二说，则斗氏之始封者为斗伯比之父，约在西周末至春秋初年受采。斗氏始封地所在，按《左传》昭公十四年（前 528 年）“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郢，以无忘旧勋”^⑥ 的记载，或在“郢”地附近。郢公斗辛所居之楚郢县在今钟祥市北境的汉水东岸一带，又，古郢国在今京山、钟祥之间。^⑦ 二者较为临近，斗氏始封之邑可能就在此区域附近。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82—683 页。

② （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91 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82 页。

④ 张君：《楚国斗、成、蒍、屈四族先世考》，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楚文化觅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75—186 页。

⑤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45 页。

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366 页。

⑦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80 页。